



蔡鴻生 著

读史求识录

DUSHI QIUSHI LU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
作品

蔡鸿生

蔡鸿生 著

读史求识录

DUSHI QIUSHI LU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史求识录 / 蔡鸿生著. —广州:

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218-06777-3

I. ①读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史学-文集
IV. ①K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6884 号

读史求识录

蔡鸿生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金炳亮

责任编辑: 柏峰

装帧设计: 新角度广告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经销: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(www.gdpgfx.com)

印刷: 恒美印务 (广州) 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6777-3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12 字数: 137 千字

版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

小 引

自 1953 年跨进历史学的门槛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读书，教书，也写书，摸爬滚打，书生气倒沾了一些，专家型则还未成型。时至今日，离“家”尚远，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徒，沿着前辈的脚印继续向前走，如此而已。

读史求识，脱俗求真，是陈寅恪先生的遗教。我虽然不敢淡忘，但践行不得力，成效微乎其微。难当然是难的。自从唐朝人刘知几提出“才、学、识”三字诀，治史的规格就被推上新台阶。到了近代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作出更具体的阐释：“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。做一个史家，需要何种观察力？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？观察要锐敏，即所谓‘读书得间’。旁人所不能观察的，我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，都由于善于观察。”所谓“善”者，意味着看得到，看得深，看得准。历史的洞察力，并非“饱学”的自然结果。读书人中，有知之士摩肩接踵；有识之士，只是凤毛麟角。力是练出来的，历史洞察力必须通过历史研究才能获得。陈寅恪先生关于“在史中求史识”的教导，犹如“在水中学游泳”一样，是平凡的真理，并没有什么玄机。

为了加深对“读史求识”的理解，互励共勉，教学相长，近年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“学理与方法”。有中心而无边际，随想随谈，个性化多于规范化。虽属“务虚”之言，但也力求落到实处。现将授课记录整合成本书的上辑；下辑则是与之相关的讲谈和文稿。另附访谈纪要一篇。大体而言，全书有结构而无系统。其中倘有片言只字可供参考，也就不负初衷了。

杀青之际，木已成舟。虽下过一番修、补、订的工夫，但不完善处、不确切处、不雅驯处，仍所在多有。自知黔驴技穷，无能为力，就让它以“独木舟”的简陋面貌，到学海中去漂流吧！

2010，春夏之际

目 录

小引·····	1
---------	---

上 辑

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·····	3
史与思 ·····	10
宗教传播史方法论浅议 ·····	17
专门史与通识 ·····	23
“粟特人在中国”的再研讨·····	30
关于知、识、文的联系和区别 ·····	36
中国学术三名著 ·····	51
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：华裔学者 ·····	70
避免架空立说 ·····	74
我们不提倡“速成” ·····	77
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 ·····	81

下 辑

仰望陈寅恪铜像 ·····	95
从手迹看心迹	
——读梁方仲教授听陈寅恪先生讲课的笔记 ·····	97

历史人物的后世造影

——陈寅恪的武则天与郭沫若的武则天·····	106
中外交通史上的胡商与蕃客·····	114
宋代舶来品“海井”和“冷瓶”引发的思考·····	120
尼姑与中国文化·····	124
文化交流的“二西”眼界·····	136
文化交流的“回流”现象·····	141
文献解读与文化研究·····	146
治学片谈·····	149
附录 访谈纪要·····	167
后记·····	181

上 辑

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^{*}

今天是冬至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年之成在于冬。今天要讲的题目覆盖面比较大。历史研究是干什么的？有什么用？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。当别人问起时，作为历史专业的师生，如果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，就未免太不专业了。以往总是把历史研究提升到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，高不可攀，类似套话、门面话，使人感到不着边际。那么，怎样才能把这个问题落到实处？今天讲“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”，就是要探讨一下历史学的功能，找个比较朴实的答案。

一、历史的主体是人

世界史，国别史，专门史，凡是史都离不开三点：时、地、人，这是“历史三要素”，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行。作为历史学科的学生，一般都有这个认识。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：这三者之中，哪一个更重要？

^{*} 本文系 2005 年 12 月 22 日“学理与方法”讲课纪要。

时、地、人里面，一定要有人出现才有历史。人未出现，光有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历史。宇宙史与社会史是两码事。在国人观念中，历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古代的知识体系，将所有的知识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按四部收藏，称其为“四库”，史学列于第二；按甲、乙、丙、丁的顺序排列，史学也称为乙部之学。近代以后，流行“百科”分类法，史学属于百科中的一科，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块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知识部门。

常常有人问我：“历史有什么用？”可知问者对历史还莫名其妙，还没有在人们心中形成共识，不像医学等学科的价值那样一目了然。

恩格斯说：“有了人，就有了历史。”这也是我前面一段话的根据。先有人，再有氏族，最后形成国家。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叫做史前史，有了国家和文字之后的历史叫做文明史。历史跟人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。

我们总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历史：民族史、政治史、经济史、法律史、宗教史、文学史，等等。在专研一个领域时，不知不觉就会出现人、事颠倒。比如，研究政治史只注意政治制度而轻视人，研究经济史只注意到土地制度、工商业组织却忽略其中的人。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偏向：人不到位，历史的主体就模糊了。

以制度史为例。制度是由人创立、制定和维护的，最后也是由人去破坏的。演变的规律就是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。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最重要的一部分讲礼仪，该章篇幅占了全书的一半。礼仪的载体是世家、士族。如果没人承担礼仪，则“礼”落不到实处。比如在分析河西士族如何捍卫汉魏的礼制，连续引用了二十四个人物传，实例实证。这大概也是陈寅恪著述

中用例最多的一处。这二十四个人物是经过仔细遴选的，并不是材料的堆砌，这种研究就是落实到人，以人为本。

以宗教史为例。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六卷十八篇，讲的全都是僧侣尤其是遗民出家当和尚的事迹。现在的佛教史，喜讲教派、经典、教义、礼仪，陈垣这种“佛门僧事”的逻辑结构，则突出了宗教史的载体。

从“二陈”的代表作可以看出，制度史、宗教史无非是人史的具体表现形式。人既是历史的“主体”，也是历史研究的“主题”。理所当然，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。

二、防止非人本倾向

以中外关系史研究为例。整个世界的交往，是由陆到海，再到海陆空的立体化。中外关系史的空间结构，涉及海路、陆路，既有物质舶来品，又有精神舶来品。研究者如果惑于皮相，就容易出现非人本倾向。

1. 见路不见人

只讲路线，考证古地名，置跋山涉水的人于不顾，成了交通史上的盲点。商胡固然是“个体户”，但不能单独行动。在这些道路上活动的是商队，那商队如何组织？不可能群龙无首。商队如何过夜？女性有多少？（可以确定的是女性所占比重很小，是被当做礼物带来的）商队城有什么样的人文景观？这些问题都不清楚，没有留下很多材料。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是这样，只要留心去找，日积月累，必有所获。

商队与军队不同，军队有将帅，组织严密，商队是临时凑合而成的。大家各带一批货，主动入伙，组成“商侣”。队伍越走

越长，人数一多，就得推举首领（号称“商主”，音译“萨宝”）出来指挥，到了目的地才自行散伙。古代商队风餐露宿，涉及防盗、防兽的问题。商队在野外过夜，通常围成圆圈，首领在中间。正因古人在丝路（其实是“碛路”）上从事诸如此类的活动，我们才对这条路感兴趣，这条路也才有人文意义。见路不见人，实际是忘其根本。

2. 见物不见人

海陆两路输入输出什么商品？对商品结构的复杂性不能低估，对商胡贩客的多样性更不能低估。将交通路线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、“陶瓷之路”，这种象征性的命名，未能反映商路和航路的实质，容易助长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取向。凡是涉及事物的客观规定性，就要小心翼翼，切不可把人云亦云当做约定俗成。谁和你约定非这样叫不可？明载于史的，仅仅是两个古色古香的路名：“通西域道”和“通海夷道”。只注意到引进了什么海外奇珍，外销了什么产品，正是视野狭窄的表现。以广州为例。广州有很多外销的丝、茶、瓷，但广州不是这些商品的产地，究竟是谁把丝、茶、瓷从产地带到广州？立刻引出“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的关系”这个重要论题。像这类题目就很少有人注意。

3. 见神不见人

一部宗教史就是一部造神史。人很奇怪，无中生有地造出神来，进而崇拜它。神从人身上异化出来后反过来统治人。人之所以造神，是因为神对他有用，因此就有这样的理论：功能化的神比人格化的神出现得早；神的面貌和功能是由人赋予的。神的世界是按照人间的模式来创造的，人间有“堂”和“狱”，神界才有“天堂”和“地狱”。阎王派小鬼来抓人，正和人间的官府派衙役抓人一样。虽然宗教后来理论化，甚至神秘化，但宗教的根

子毕竟在人间。

宗教研究关注经典的传播、教义和礼仪。关注的人无非两类：教士（僧人）和信徒。他们的关系如何建立？信徒为什么信教？如何信教？他们通过什么渠道与神沟通？用什么语言与神沟通？我认为绝不是通过思想、语言，而是通过心灵去沟通。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心灵的问题。宗教信仰无关思想、知识、感情，而在于心灵。宗教传播通常盛于乱世，这是因为乱世动荡，人们更需要心灵的慰藉。宗教史的研究如果见神不见人，必定以“空空如也”告终，有什么意思呢？

三、知人论世是历史学的功能

历史学有什么用？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知人论世。这里涉及时间的问题，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古代的宗教也早有此说了，如摩尼教的三际论，就是指时间的三个阶段。然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实际是两段加一条线，所谓现在，就是过去衔接未来的一条线。现在立刻就变成了过去，一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。而未来之所以叫未来，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到来，因此大量存在的是过去，重头戏是历史。由于现在立刻就过去，连一分钟的稳定性都没有，所以任何理论不能在现在检验；理论要自圆其说，全部要靠历史作为基础，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。以历史补充现实生活的不足，以大量的历史间接经验补直接经验的不足，通过前人往事来增长我们的见识。当然，理论正确与否，最后是由实践来检验的。现在提出的理论，要由日后、未来的实践去检验，特别是一些带有预见性、假设性的理论。

当代开放改革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，政治（联合国）——经

济（世贸）——体育（奥运会）都先后融入，与外国的交往越来越多，这就需要回顾古代中西交往的历史。

知人论世，大量涉及历史人物的研究。翻阅开放改革前的旧期刊，可以看到许多研究历史人物的文章，其中包括曹操、武则天、海瑞、洪秀全、武训等等，说明其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很受重视的。当然这些研究多带有浓厚的时代政治色彩，一些观点和方法，已经变成昨日黄花了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历史人物的研究被边缘化，被忽视，也未必是正常的。其间的原因，并非我们现在所要探讨。

我们所要探讨的是：怎样才能做到知人论世？我认为，首先要避免以下两个倾向：一是别把历史人物理想化；二是别把历史人物现代化。这两个都不好。陈寅恪先生提出要有“了解之同情”。“了解之同情”，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，要设身处地，考虑历史人物的言行所处的环境，形成理性化的而不是情绪化的历史感，不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。虽然很难做到，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来坚持。

知人论世强调理性的历史感，无非是因为今人与古人隔着时间、空间、心理这三重距离；其中，心理的距离特别难以拉近。以20世纪30年代齐白石纳妾一事为例。齐白石年轻时是一个木匠，后来决定往美术界发展，就独自去北京，把妻儿留在湖南老家。齐夫人担心丈夫在京的起居生活，专门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，为他物色了一个年轻女子，亲自为齐白石纳妾。以今人的观念来看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而这可是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事呢，在当时，夫人为丈夫纳妾是符合伦理观念的。提供这样一个事例，就是要证明心理的距离多么难以拉近。至于涉及主张、见解和理念等，那就更加复杂。这里我们略举几个例子。比如，西方

文化中代表热烈、爱情的玫瑰，在中国宋代就被文人戏称为“刺客”；我们常听说的“重在参与”，这是一个洋观念，中国人的观念是重在观赏；在西方，决斗是对人的尊严的重视，在中国就绝对行不通，因为中国反对轻生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；又如现在我们常以“夹道欢迎”形容仪式的隆重，但在古代中国，最隆重的欢迎方式其实是“清道”，要人们肃静回避。诸如此类，举不胜举。可见古今中外观念的差异之巨。

最后可以归结为几句话：我们讲“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”，就是说人是主体、人是主题。历史研究要从人出发，向人回归。历史就是“人史”，这一点我们要牢牢记住。历史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知人论世。“知人”的“人”，包括个体和群体；“论世”的“世”，包括时势和时代。对历史一窍不通，没有间接经验为借鉴，是知不了人，更论不了世的。

史与思^{*}

上个学期，我们选读了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岑仲勉、陈垣、向达、冯承钧、钱锺书、季羨林等八位前辈学者十来篇有关中外交流的重要论文。我们为此立了个课程名称，叫“中外交流名文研读”。称其为“名文”，在此要作一题解。陶渊明有诗云：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郭沫若称毛泽东著作作为“雄文四卷，为民立极”。我们的课程所选文章别具一格，既不是“奇文”，亦不是“雄文”，因为这些文章皆为著名的学术论文，所以称之为“名文”。下面就我个人学习这些文章的领悟，讲讲历史研究的思维结构，作为上学期名文研读的小结。

历史研究的思维结构，多层多面。如果化繁为简，似乎可从基本的程序说起。

^{*} 2005年上半年，为了让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生了解20世纪中西会通的学术传统，领会前辈学者的治学眼界，增强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，我们曾以“中外交流名文研读”为题，要求研究生研读下列文章：王国维《西胡考》、《西胡续考》，陈寅恪《四声三问》、《支愍度学说考》，岑仲勉《外蒙于都斤山考》，陈垣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、《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》，向达《唐代俗讲考》，冯承钧《何满子》，钱锺书《汉译第一首英语诗〈人生颂〉及有关二三事》，季羨林《浮屠与佛》。以上文章由学生独立阅读后，分篇进行课堂讨论，交流学习心得。在完成全部阅读和讨论后，于2005年9月1日新学期伊始作了总结讲话，本文系讲话纪要。